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明年是香港回歸三十周年，本刊計劃組織專輯，邀請專家學者撰文，深入探討過去三十年香港社會的種種變遷；有關香港研究的學術論文及書評亦非常歡迎，懇望海內外學者惠賜鴻文。

——編者

學生權威的家庭來源

對於文化大革命初期進駐大中學校的工作組問題，以往已有諸多研究，楊雋〈「老革命」碰着「新問題」?——文革初期北京中學「反工作組」事件考察〉(《二十一世紀》2026年2月號、4月號)一文的不同在於，作者跳出傳統的「毛劉鬥爭」或「壓迫」與「反壓迫」的論調，認為工作組對部分學生的彈壓，不完全歸因於工作組本身，而首先歸因於在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的背後策劃，以及高幹子弟在中間的上下其手。劉鄧的作用已為人所知，文章更着重突出高幹子弟的作用，揭示他們積極配合工作組，直接向劉鄧匯報，影響運動進一步左轉，能量甚巨。從這一角度看，1966年6月上旬至7月下旬的「五十多天」裏，正是借助高幹子弟的激進路線，劉鄧才達成了在學校中找出所謂「壞人」、「反革命」的目的；只是劉鄧此次對毛澤東的意思理解錯了。

文章強調學生的社會背景，清晰表述了他們的家庭關係。也許是因為材料受限，一些文革研究常會忽視此點，但從實際操作中不難看到，父母、配偶等因素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成為主要原因。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左派」的頭號幹將劉平平是劉少奇之女，憑此身份，她得以直接向劉少奇提出問題，並直接加入到工作組中領導運動，在權威受到質疑時，她更逕直展示劉少奇的指示。劉平平等人和工作組的激進路線導致不少人反對，而反對的人群中也同樣不乏有背景者，他們的父親有不少亦於軍中任職，其「後台」是他們敢於反對的根本。

文革肇端於文教界，但隨後迅速擴散到社會各界，這是為何？在運動一開始，原有體系就已有大量矛盾，黨、政、軍高層都有分裂之勢，遠非僅僅毛劉之間的鬥爭。此外，運動中個人選擇的「正確」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他們的「後台」，與是否反對工作組並無太大關係。在劉少奇未倒台時，劉平平反對工作組，原來的工作組就被撤換了，其他人反對工作組，就成了「右派」學生搗亂。她的權威自然是和「後台」劉少奇緊密聯繫的。

最後，對於文中所要表述的社會內在矛盾和學校內累積的矛盾，筆者認為也許還要更具體地討論。前已提及，許多後來批判工作組的學生同樣也是高幹子弟，那麼也就表明他們的社會背景其實並無二致，出現分歧還是因為運動中的一系列舉措。文章較多的篇幅實是敍述文革中的矛盾，對文革前的矛盾引致的分裂還需進一步論述。

張君龍　香港
2026.4.30

從財政角度解讀小學教育

丁旭輝〈從央地財政關係看建國初期的小學普及教育〉(《二十一世紀》2026年4月號)一文，聚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小學普及教育由大力推行走向停止發展的歷史過程。丁文的研究顯示，1950年代前中期中共的小學教育政策，被簡化為對學齡兒童入學率的重視，成為一種可被量化的評估標準。在「為工農服務」的教育工作總方針和革命精神的引領下，各地小學數量和生源人數迅速膨脹，以至教育部於1951年提出五年內爭取達成80%學齡兒童入學率的樂觀計劃。然而，伴隨多地小學招生

超規模發展，一系列關於師資、校舍及經費的壓力隨之顯現。

丁文依託扎實的地方檔案與史志材料，揭示了中央教育普及規劃與地方實踐之間的脱節。對比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的理路，文章的一項突出貢獻在於，將小學教育普及的起伏納入央地財政關係視角下加以考察。引入經濟史的視角進行解釋，更能夠釐清政策失衡與計劃脱節的癥結所在，為讀者勾勒了清晰的經濟與制度邏輯。如文章所示，鄉村小學經費處於中央政府預算之外，決策卻由中央作出，導致實際財政壓力截留於地方部門。為保證普及教育的目標達成，地方上採取「民辦」、「公助」以及徵收地方糧等形式維持，但面臨「窮人不能唸書」的輿論與政治壓力。1952年，隨着中共認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已「根本好轉」，鄉村小學教育經費被編入國家財政的收支體系中，但原先地方小學教育發展的失控，並沒有因為國家權力的介入而有效緩解，反而將經費壓力向上傳達至國家財政體系中。因而，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後，在經濟建設優先的背景下，小學教育擴張的腳步被遏制與整頓。1954年，中央再次將部分小學教育經費下沉地方自行籌措。

丁文的分析精要地揭示1950年代前中期小學教育的興衰起伏，不應簡單理解為教育政策的前進與退卻，而應看作國家能力、財政體系與地方實踐複雜博弈的歷史過程。比照既有研究，作者或許可以稍加補充的是：文章所討論的案例主要涉及山東與河南兩省，其他地區是否有類似的情況，還是存在可供比較的地域差異？1956至1957年全國性的學潮及日後文教領域的「教育革命」，又在多大程度上與小學教育政策的進退有關？此外，鄉村小學內部的教育質量與師資培養形式如何？除了向民眾籌措經費外，地方政府是否有過其他渠道開發教育資源的嘗試？這些問題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挖掘地方檔案與民間史料進行專題研究。

曹子尼　上海

2026.5.2

國家視角下的節育推廣

中國於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至2021年進一步推行「三孩政策」，標誌着延續數十年的嚴格計劃生育體制逐步轉向鼓勵生育。回顧其歷史實踐，無疑有助於理解國家如何介入人口與社會結構的形成。在此脈絡下，鄭欣悅〈技術下鄉：河南省Y縣農村計劃生育的實踐與困境(1973-1980)〉(《二十一世紀》2026年4月號)以縣域為單位展開個案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文章突破既有研究將節育技術簡化為政治任務或醫療服務的取向，提出「技術治理」與「身體管控」的分析框架，指出節育技術實為國家權力滲透個體身體的重要媒介。作者依託縣級衞生健康委員會檔案，並結合對計生幹部、技術人員及農村民眾的訪談，從節育技術的選擇與推廣入手，細緻呈現上環、結紮與引流產等措施在基層的運作邏輯，揭示國家如何將生育行為轉化為可操作、可監管的治理對象。同時，文章亦關注民眾的應對策略，如私自取環、逃避孕情檢查等，從而展現政策、技術與基層社會之間的動態張力，避免了單一制度或技術視角的簡化處理。

然而，儘管作者試圖納入基層互動與民眾回應，整體分析框架仍以國家治理邏輯為核心，呈現出明顯的「國家視角」，民眾行動多被納入對治理成效的解釋之中，而較少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換言之，民眾的策略性行為雖被描述，卻未充分轉化為具有解釋力的分析資源。此外，文章在闡釋技術治理時，多採制度導向的抽象表述，將個體身體納入可計算、可操作的治理框架之內。此種處理固然有助於揭示國家權力的運作機制，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個體經驗與倫理張力，使文本呈現出某種分析上的距離感。這些特徵或與作者主要依賴縣級檔案材料有關。

筆者亦曾利用縣級檔案研究上山下鄉運動，對此類材料與研究方法的張力有所體會。此類檔案雖涵蓋公社、大隊乃至生產隊層級，具有顯著的「基層性」，但其本質仍服務於行政運作與治理需求，內在地帶有管理者視角。若未對此加以方法論反思，直接用以分析基層社會，則可能在不自覺中複製國家的觀察框架。如何在利用此類材料的同時，轉換分析視角，將民眾實踐提升為解釋性資源，或為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深化之方向。

張寧　牛津

2026.5.5